

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

——读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

方洪勇

的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则一马当先，内容共有五个篇章，即分为五个中篇，里面的每个篇章独立成一个故事，聚焦脱贫攻坚实践中的新风尚新面貌，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形成一部反映这一领域的风貌与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其实，早在三年前即2018年，《人民文学》就连续分别以头题推出了欧阳黔森反映贵州脱贫攻坚系列题材的三个报告文学，那就是2018年第1期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2018年第3期的《报得三春晖》和2018年第9期的《看万山红遍》，这“三部曲”全部为贵州题材、贵州故事，其巨大的影响力为脱贫攻坚重点地区的主题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欧阳黔森在《江山如此多娇》创作谈中讲道：“扎根人民，为人民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当……”欧阳黔森时常行走在云贵高原云贵山山东延地带，他跋山涉水，做到真正扑下身子、深入乌蒙山区，无数次来到脱贫攻坚的前沿，与扶贫干部打交道，和贫困群众交朋友，他亲身感受旧貌换新颜的现场，在采访中寻觅其中富有趣味的人物和事件。正是在与老百姓朝夕相处中，忧惠着他们的忧患，欢乐着他们的欢乐，体味着他们在生

活、生产和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他能真切感受到贫困山区千百年来的贫穷之苦，也深刻体会到决战脱贫攻坚之不易，对战胜贫困的重大历史意义有了更多思考。可以说，其融入乡村的写作姿态可嘉，其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可赞。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贵州山区现实特征，以及贵州山区发生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作家欧阳黔森写出来的，而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在长篇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的第一篇章《报得三春晖》中，作家欧阳黔森在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乌蒙山区赫章县海雀村深入生活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精准扶贫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一贯坚持眼见为实……”从文中可以看出，只有作家自己在采访、在与老百姓促膝谈心的过程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对共产党、对政府的那份感恩，欧阳黔森在报告文学中书写的感情如同乌蒙山区的老百姓一样，是如此的真挚、纯粹。又比如第二篇章《花繁叶茂》，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从最初贫困荒芜的“荒茅田”到花繁叶茂的“花茂村”，即从贫困村到小康村，再到“百姓富、

生态美”的一个美丽蝶变故事。欧阳黔森曾十几次深入花茂村，同当地老百姓一起生活，整整两年之久。他曾说：“脚上沾满泥土，作品才有可能散发出泥土的芬芳。”是的，他是真正把双脚踏在这片散发出芳香的土地上，用手中的那支笔、用一颗真挚的心，以对时代、对人民“走心”和“用情”的艺术态度，踏实深入基层蹲点调研、采访实践。将发生在脱贫攻坚进程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变成一部又一部接地气、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无论是海雀村、花茂村、红岩村，还是石砂镇、沙坎村，它们其实就是贵州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欧阳黔森把职责扛在肩上，将那些震撼人心的攻坚故事、鼓舞人心的战斗捷报书写成报告文学，还被搬上了荧幕。

贵州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是无数人为了信仰和初心负重前行，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欧阳黔森以主人翁的精神、用满腔的热血投身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洪流中，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书写新时代激动人心的新史诗——《江山如此多娇》。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将成为一个历史记忆的存储器，让身处未来不同时空的读者，感受到“贵州故事”里脱贫攻坚和新时代乡村振兴带给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山乡巨变。

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深度融合的学术佳作

——评蔡熙《〈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王 银

《亚鲁王》是活在苗族丧葬仪式上的活态史诗，集唱、诵、仪式展演于一体，对苗族的神话、历史、语言、宗教、哲学等都做了非常珍贵的唱述。蔡熙教授的《〈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一部对《亚鲁王》史诗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该著运用文学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法深描《亚鲁王》史诗的仪式叙事和唱诵史诗的东郎，探讨仪式的精神治疗功能和史诗的传承与保护，深掘史诗的多元文化蕴涵和诗性特质，力图从史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和研究路径，进而为文学人类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鲜活的本土证据。

重视田野调查，深描仪式叙事田野调查是民族志收集的主要途径，是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必不可少的方法。《〈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一书凸显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客观记录了很多原始资料。作者全面采集、整理仪式过程和采访歌手，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结合史诗得以存活和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深描复杂多样的仪式程序和东郎的习艺过程，深掘仪式中蕴含的原始文化密码，是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

仪式是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东郎在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亚鲁王》史诗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著在仪式叙事的基础上分析了《亚鲁王》史诗作为“非遗”的重要特征——活态性和原生态性，探讨了《亚鲁王》史诗目前面临的传承危机，提出了《亚鲁王》史诗传承与保护的策略。作者认为，非遗是一个民族的“DNA”，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这种认识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依据。

立足文化文本，深掘多重意义《亚鲁王》史诗是从远古时代流淌到今天的活态史诗，蕴涵了苗族的原始文化、宗教信仰、宇宙观念、民俗习惯，潜藏着苗族人民的精神情感、思维方式和道德品质。作者对于《亚鲁王》史诗的研究，不仅仅从田野的活态性考察，而且立足文化文本，将文本证据、田野资料、实物图像视为一个文本的集合，对《亚鲁王》史诗的多重意义进行了深度发掘。

该著运用象征学派人类学家格尔兹的“符号解释学”对《亚鲁

王》史诗的多元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度阐释，丰富了《亚鲁王》史诗的意义解读。作者通过解读《亚鲁王》史诗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日月神话和龙心大战神话，探寻了人类思维和文化编码的源头，论析了苗族先民的宇宙观，论证了《亚鲁王》史诗中蕴含的笙鼓文化和绿色的生态文化。

《亚鲁王》史诗是一部复合型史诗，苗族的迁徙是史诗的核心内容。作者从史诗古歌文本的迁徙叙事、身体展演中的迁徙叙事、实物和图像中的迁徙叙事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多维形态，阐释了《亚鲁王》史诗呈现了本民族的社会、道德、价值、伦理等规范，为族群文化认同提供了可靠的现实典范。

《亚鲁王》史诗属于诗的范畴，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了苗族的创世、征战史、迁徙史，是诗化的苗族历史。作者从史诗的形式入手，论证了《亚鲁王》史诗的诗性特质，为史诗的审美特征研究提供了借鉴。作者提出，在史诗的形式特质上，史诗具有鲜明的程式化特征、轮回的神话叙事结构、独特的

表达方式；在史诗的人物特质上，亚鲁王是一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关爱民生、精通巫术的“文化超人”。

运用多重证据，整合文化视野口传和仪式展演材料、图像与实物证据是作者深入田野调查的重大收获，运用多重证据法解读《亚鲁王》史诗的文化意蕴是该著的显著特色。作者根据口传和仪式展演的材料，论证了苗族先民企望通过在丧葬仪式上反复唱诵《亚鲁王》史诗，实现与祖先的对话，让死者能够回归祖先的身边。作者考察苗族迁徙历史时，从图像和实物中找到了根据，还原了失落的文化真相。该著指出给亡者脸上盖上四方形的绣片“陌就”，“陌就”上有变异了的太阳花，四周的环境是谷穗和蝴蝶，这是苗族先民对东方故国的历史记忆。同样，苗族的服饰图案也是苗族迁徙的物证，它们用无声的语言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作者通过将文字文本材料、口头和仪式展演材料、实物和图像材料结合起来，在多维视野、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对《亚鲁王》史诗进行了跨学科研究。

《村庄旧物》中的诗意历史与文化情怀

斯 力

阅读杨秀学散文集《村庄旧物》，心里氤氲着缱绻缠绵的乡愁情绪，欲罢不能。作家用心地叙写乡村旧物，将清水江流域苗乡侗寨的传统习俗铺陈得场面如此宏大，细节如此缜密，炽热的乡恋情结如同春天飘飞的柳絮，彩蝶纷飞，花枝招展又如丝丝缕缕。

在《村庄旧物》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温馨的乡村旧居。作家带着深邃历史的眼光和深层的文化思维，追踪着生命成长的步履、追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精致的文字叙述里，凡涉及村落，始终在进行着一道又一道深远的灵魂拷问：我们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为什么在此停留？在《穿越历史》中，厚重的历史情绪力透纸背：“坳上有座老坟，墓顶为羊角型，墓门、门楣、门楹均为青石条块砌筑，墓门字迹清晰可鉴：生于乾隆癸亥年，歿于道光丁酉年。”建立了物证基础上的村寨记忆真切契合了苗族的历史，从苗族古歌所记载的历史寻迹，祖先“爬山又涉水”“翻山又越岭”方才寻找到了苗岭“金窝窝”“银窝窝”这块神秘的土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与乡村辽阔雄奇山川大环境下的乡愁不同，作家对乡村旧居的描述与记忆，表达了一种深沉内敛、细腻温馨的怀念，让我们品味着具有浓烈烟火气息的家园记忆。栖居于苗岭山麓，开门见山，山川连绵。青山绿水，无疑是最鲜明而又独特的环境特征与美丽色彩：“溪边是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地名概念，是一条溪流其中一段的两岸，许许多多的童年梦、少年梦就在这里启航。”这些所谓的“边”，其实并不边，毫不遥远，而是搁置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家园：“溪边怡人的美景正好与谈情说爱的心情匹配……从‘初相遇’到‘久的伴’，再到生死相依，一出入人间情爱酣畅淋漓地上演，有情型，慕门、门楣、门楹均为青石条块砌筑，墓门字迹清晰可鉴：生于乾隆癸亥年，歿于道光丁酉年。”建立了物证基础上的村寨记忆真切契合了苗族的历史，从苗族古歌所记载的历史寻迹，祖先“爬山又涉水”“翻山又越岭”方才寻找到了苗岭“金窝窝”“银窝窝”这块神秘的土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与乡村辽阔雄奇山川大环境下的乡愁不同，作家对乡村旧居的描述与记忆，表达了一种深沉内敛、细腻温馨的怀念，让我们品味着具有浓烈烟火气息的家园记忆。栖居于苗岭山麓，开门见山，山川连绵。青山绿水，无疑是最鲜明而又独特的环境特征与美丽色彩：“溪边是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地名概念，是一条溪流其中一段的两岸，许许多多的童年梦、少年梦就在这里启航。”这些所谓的“边”，其实并不边，毫不遥远，而是搁置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家园：“溪边怡人的美景正好与谈情说爱的心情匹配……从‘初相遇’到‘久的伴’，再到生死相依，一出入人间情爱酣畅淋漓地上演，有情型，慕门、门楣、门楹均为青石条块砌筑，墓门字迹清晰可鉴：生于乾隆癸亥年，歿于道光丁酉年。”建立了物证基础上的村寨记忆真切契合了苗族的历史，从苗族古歌所记载的历史寻迹，祖先“爬山又涉水”“翻山又越岭”方才寻找到了苗岭“金窝窝”“银窝窝”这块神秘的土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儒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典范

——读谭德兴《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

付呈星

贵州地处西南多山之地，儒学在贵州长时间呈现出凝滞的发展状态，直至晚清时期，以黎庶昌、莫友芝、郑珍等为代表的贵州近代儒学先锋打通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儒学之路，呈现出儒学蓬勃兴起之状。谭德兴教授从贵州儒学与文化、贵州儒学与文学的角度切入贵州儒学的研究，《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中华书局2021年11月出版）是他在该领域深耕的宏大成果展示。这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的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关于近代区域儒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典范之作，结项时与出版后均获得了学界极高的评价。

谭著作以家族、科举、史学、经学与女性文献为类型代表，以近代贵州文人群体的心路历程和著述述况为考察中心，以儒学与文学互动的研究方法，探索近代贵州儒学繁荣的原因，提出儒学的发展繁荣是近代贵州文化与文学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全书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取得的研究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对进一步研究儒学与文学之互动关系，儒学南传之表现、特点与影响，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在史学视域下呈现了贵州近代儒学繁荣的一段历史。作者从大量的志志文献、地方志、图谱中梳理出近代贵州儒学家涌泉而出、儒学著作影响海内外、儒学学官与书院大肆兴起的发展盛况。深入研究黎庶昌、郑珍、傅玉书、孙应鳌等儒者在经学、文学、小学、音韵、文献学、图书收集与刊刻上的巨大文化功绩。新著对贵州区域儒学以人物为核心的深入研究，是将遥远的先贤与生息不息之薪火相传的儒家文明相联系，在历史的谱系中寻求贵州儒学之士延续不绝的精神之光。

本书从地理视域呈现了近代贵州书院及其儒学精神，在历史地理的谱系中挖掘出明清时期贵州共有书院141所，这些书院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本书对这些掩映于山林之间的书院做了系统的研究，并阐发其选址、建筑、园林景观、研习内容等方面所具有的儒学意蕴。对这些书院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起贵州近代与当代学术脉络的纽带，让后世知识分子在书院这一历史的遗存中感受儒家文化的传承脉络与贵州先贤自觉传承并实践儒家文化的责任担当。本书揭发那些掩藏在历史废墟中的贵州书院文化遗产，她们在贵州儒学发展过程中承担起儒学知识教育与心性教育的双重功能，她们曾经承

担了一段儒学繁盛期最为朴实动人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功能。

本书呈现出家族视域下的儒学之光。家族文化是近代贵州儒学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遵义沙滩文化家族在近代贵州史上尤为显著。遵义沙滩文化家族主要由郑、莫、黎三家组成，三家互通学术、互教子弟、互通婚姻，形成地域、姻亲与学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家族联盟。黎氏镛经堂成了沙滩学人共享的精神资源，郑珍在这里“鼓篋读之，恒达旦夕，肘不离案，衣不解带”，黎庶昌徜徉在这“缺墙西南隅，面山有庭三楹，积书二万卷”的书籍的世界里。镛经堂以丰富的藏书，融万物荣枯之荷花濯利于其间，成了建构黎庶昌、郑珍、莫友芝儒学知识的最初源泉。镛经堂成了沙滩学人儒学建构的原点，是他们精神的故乡与生命故乡的合一，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散发着沙滩文化气韵的儒学精神散发开去。

岁月的沧桑化为文字与历史在沙滩家族文人的精神血脉中代代相传。本书还指出儒学熏陶下的黎氏家族重视其乐融融的家族伦理，他们通过诗篇、散文、墓志铭等文学形式呈现出一个文化家族显著成就背后巨大的亲族之情。黎氏家族诗歌书写是关于志向、理想、伦理与亲情的综合书写。儒学浸润下的黎氏读书人以诗书为基点，以故乡为起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黎氏读书人敦睦室家、孝亲父母、琴瑟妻子、和睦兄弟，呈现出其乐融融又生生不息的家族情感和家族力量，这种力量绵延至今，成为沙滩学人共享的精神渊源。

本书从历史、家族、女性、区域等维度呈现出贵州女性视域下的儒学华丽篇章。本书在零散的历史文献中收集并考证贵州女性文学作品，呈现出贵州近代儒学滋养下五彩斑斓的女性诗篇。这些诗篇承载了贵州女性的生命意识、儒家操守与审美特质，是年华与青春、美好与无奈、命运与理性的诗情承载，是一个沉浸在儒学与文学世界中的女性最为悠远有力的呼唤。作者从那些隐藏的文献里挖掘出鲜活而又美好的贵州女性之声，她们用诗性的语言诉说着近代贵州女性文学与儒学相依相存又略带紧张复杂的张力，在大山深处吟唱出一曲高亢而清亮的女性华章。

谭德兴教授《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从历史、地域、文献、家族、书院、女性等维度揭发近代贵州儒学繁荣的样态，在儒学与文学的研究视域下揭示出贵州近代蔚为大观的儒学与文学交融形态，是儒学与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生活的模样

——看电视剧《人世间》

刘国琪

最近深情献映的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以周氏三兄妹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用史诗般的磅礴力量书写烟火人间，其纪实的社会背景、丰满的人物情感、曲折的故事情节，使观众在寻常生活里不难窥见时代潮流、潜移默化中不惑感知到人间“真善美、烟火味、家国情”。

戏如人生，《人世间》塑造了周父、周母、周秉昆、周秉义、周蓉等生动、立体的物象形象，多层次、多层次地描绘“真善美”的实质，将社会变迁和百姓生活有机结合并进行了生动呈现。电视剧中，周父是支援三线建设的技术工人，踏实隐忍。周母虽不识字，但明事理、达人情，懂得知识改变命运、勤劳改善生活的朴素道理。周秉昆真诚忠义、骨子骨里不阿、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让观众记忆深刻。在平凡的生活里，周氏一家拓展和延伸了亲情与善良的内涵，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爱。

《人世间》荡开的，是人世间的“烟火味”。炊烟袅袅之处，便是生存依托之所。“光字片”是诞生于20世纪特殊岁月里、黑土地上的城市棚户区。“光字片”里的人，日复一日地在人间烟火里相互取暖，结成“远亲不如近邻”的人情社会，抒写质朴的乡土生存哲学。无论是代表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的周氏三兄妹，还是演绎“小人物”的国庆、赶超、德宝等人，诠释的皆是“热乎乎的日子与人，总在诉说人间值得”，坚定地生活、为理想不懈奋斗。“光字片”里的“景”，生活用的铜瓢碗盆，孩子玩耍时的跳皮筋、翻花绳、滚铁环、扔沙包等，都仿佛是穿

越时空照搬过来的生活景象，留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时代记忆里。

越时空照搬过来的生活景象，留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时代记忆里。

越时空照搬过来的生活景象，留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时代记忆里。

